



### 陈寅恪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这个名字背后有着太多的传奇——他出生于维新变法世家，却一生与政治绝缘；他曾留学十六载，却未拿一个文凭；他声名远扬，得到牛津大学聘请，受到斯大林和英国女王尊重；他中年双目失明，患有心脏病、失眠症等疾病，却口述完成鸿篇巨著。更加传奇的是，他用生命抒写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范。

#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 紫苑学会 忆铭

## 远渡重洋的博学鸿儒

---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吴宓

---

清末明初的治学大家，大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陈寅恪也不例外。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中实务救国的典型人物。其父陈三立曾辅佐陈宝箴进行湖南的变法改革，开创了湖南一派全新局面，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誉为“维新四公子”。变法失败后，陈三立转而钻研学问，有大量诗作传于后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

出身于这样一个维新世家的陈寅恪，自幼既受到传统的家塾教育，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皆耳熟能详；又不乏家族的维新思想影响，数学、外语等学科也十分优异。受益于陈三立对留学的开放态度，早于1902年，陈寅恪即随兄衡恪赴日本留学，其时陈寅恪不过13岁。后因足疾缠身，陈寅恪于1905年提前结束日本留学生涯，回家养病。1910年陈寅恪考取官费留学生，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再度回国。直至1918年，一战结束，陈寅恪获取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洋，曾在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又赴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与此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此期间，陈寅恪博览群书，研读了梵文、巴利文等多种语言。直至1925年，陈寅恪受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留学生涯才告结束。

陈寅恪之留学经历于古于今都堪称奇。一则历时之久。自赴日留学起，再赴欧洲诸国，至留学美国哈佛，再至第二次留学德国，陈寅恪在海

外留学时间长达16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则学位之谜。陈寅恪留学十几载，居然连一个学位都没拿，他生平的唯一一张学历是出国前所毕业的复旦公学的文凭，仅相当于高中学历。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1925年，陈寅恪得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成为日后的“四大国学导师”之一。这一年，他年仅36岁。

## 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教授”

---

“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吴宓文集》

---

1925年，正处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大学过渡时期的清华学校开设了研究院，下设国学门，即后来常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是清华历史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国学研究最为光辉的一页。虽则国学研究院仅仅存在了四年时间，但是她对于中国近代文、史、哲人才的培养及众多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开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国学研究院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则是“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学贯中西，各具特色，奠定了国学研究院的鼎盛时期，培养了一批批大家。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都是当年国学研究院的门生（详见本刊2010年第2、3期合刊）。

国学研究院成立之际，清华请来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三位著名学者担任导师。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在学术上同样著述等身；王国维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开创了



中年陈寅恪

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研究方法；赵元任则是从哈佛归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这三位导师虽则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在学界大名鼎鼎。

相比之下，陈寅恪是最晚受聘的国学导师，也是当时名气最小的一位。然而，陈寅恪渊博的学识却使得他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

陈寅恪上课旁征博引，风格独树一帜。据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回忆，陈寅恪上课时总是抱着很多书——在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他会抱着黄布包的书；而讲授其他课程，则抱着黑布包的书。他在课上纵横捭阖，课余还经常与同学们探讨各种问题。如他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都给学生讲

述得清清楚楚。

1932年夏，陈寅恪为清华中文系招生出题，考题简单得出乎意料，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对子，上联是“孙行者”。很多学者对于将对对子这种文字游戏作为大学的招生试题很不解，然而陈寅恪有他的理解。他认为，对对子这种方式能够凸显中国传统语文的特色，特别是在与印欧语系的比较之中，更能体现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

陈寅恪被称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对于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正是由于陈寅恪治学面广、严谨求新、知识广博，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旁听，外校学生也来旁听，更有甚者，其时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刘文典和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诸多知名教授也来旁听陈寅恪的课程。正如吴宓所说，“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教授的教授”的称号就这样流传开来。

### 孜孜不倦著书治史

---

“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胡适

---

陈寅恪留学16年，从西方学到了什么？很多人不免惊奇，这样一个喝了多年洋墨水的人，却从西方带回了东方学。他在哈佛学习的是梵文和巴利文，到了欧洲，依旧研习东方的古文字学。一说陈寅恪具备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8种文字的能力，另一说他通晓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然而，在那个革旧迎新的年代，陈寅恪却是最遵从中华古典文化的人之一。他一生的著述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并一直关注中国古代历史，并未对他国历史进行研究，但是他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还得益于将西学观点融会贯通于中国史研究。

陈寅恪在研究上涉猎很广，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敦煌学、佛教经典、古文字、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著述。当年他在国学研究院教书之时，旁征博引，用多种语言上课，学生莫不惊叹于陈先生的语言造诣。其实，陈寅恪只是将

文字作为研究史学的工具，他一生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古史。

陈寅恪早年的研究，极其遵从史料。他的研究体现了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这也与他的藏书资料详实有着直接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战，陈寅恪也随清华大学一起迁往昆明。旅途漫长，在颠沛流离之中，陈寅恪的藏书也遭到损失，再至内战时生活艰辛，只有卖书以购煤取暖，陈寅恪的藏书再次损失。他再也不能像早年一样，上课时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藏书的一度削减，也促使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变。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陈寅恪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传世之作，也奠定了他在中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此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近乎失明，加之藏书不再，他几乎依靠记忆，去搜索曾经读过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所有书籍，然后回过头来，以论带史，完成了这两部著作的撰写。晚年的陈寅恪仍然著作颇丰，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他以坚强的意志品格与病魔搏斗，写下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等论著，并在助手的帮助下，将旧文编为《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

陈寅恪的著述，往往有新奇之见解。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在论及唐朝衰亡的原因时，陈寅恪将其归咎于“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元白诗笺证稿》则从文史结合的角度研究了元稹和白居易的作品，是陈寅恪以史释诗、诗文证史的代表作；《论〈再生缘〉》考证了《再生缘》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具体情况，重新发掘了弹词《再生缘》的价值，推翻了中国古代未有长篇史诗之旧识。

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理解国史，其见解往往受到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给予了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也正是因为如此，牛津大学曾两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他们认为陈寅恪是“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今天，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北侧，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它正面书写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就是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毅然矗立，历经八十年风雨，却传递着同一种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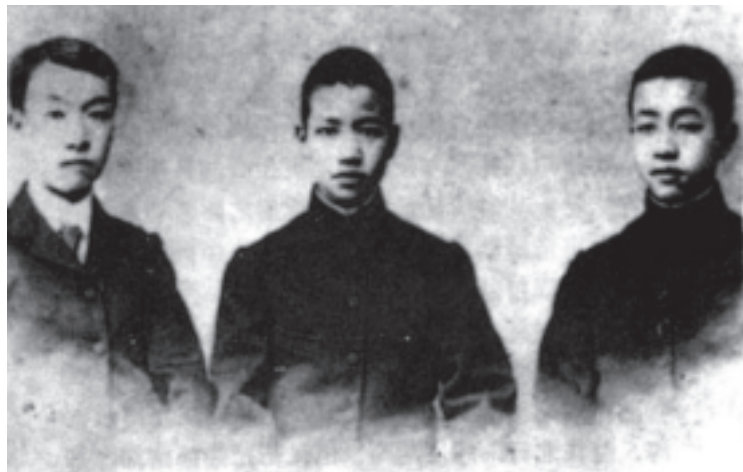
1927年，风头正劲的国学研究院遭遇重大损失。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感到清朝复国无望，顿生凄凉，作为满清遗老的他自沉于昆明湖，享年51岁。正值学术高峰期的王国维的离去，对于国学研究院、清华乃至全国学术界莫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学者们纷纷缅怀大师，寄托思念。

在王国维投水自沉后两周年，陈寅恪撰写了《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梁思成设计碑身，由师生捐款建成王国维纪念碑。这座简单而肃穆的纪念碑之所以闻名于后世，不仅在于王国维的声名远扬，更在于陈寅恪所撰碑文之语意深长，耐人寻味。

碑文中评价：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04年，陈氏兄弟在东京留影（左至右：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



陈寅恪夫妇与长女陈流求合影于战前清华园



竺可桢（左一）看望老友陈寅恪（左二）

陈寅恪认为，即使王国维乃一代国学大师，但是他的著述和学说也可能有不正确或不完善之处，但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是与日月同辉，永不磨灭。

碑文所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仅为王国维的治学理念，更是陈寅恪毕生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

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陈寅恪历经了从清朝到袁氏称帝、军阀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再至内战、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虽则世道变迁，他却坚持独立思考，不惧权贵。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方专程请他到已为沦陷区的上海任教，他再三拒绝；解放前夕，时任国民党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邀他去台湾、香港，陈寅恪同样婉言拒绝。不仅如此，陈寅恪还做了数首诗以表达自己对蒋家王朝的失望，《青鸟》一诗可见一斑：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笈千版费编裁。  
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曾指出国民党失败的根源——“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又曾撰写诗句表明自己对于登门访客的不合作态度——“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1947年，王力（右）和陈寅恪在岭南大学陈家门前

解放之后，陈寅恪一直任教于岭南大学，后因院系调整，继续任教于中山大学。史实一再向我们证明，陈寅恪先生辞去国民党的聘请，只因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

做人如此，治学更是如此。陈寅恪一生著述莫不遵从自身的观点，往往有别于前人和他人的论点。他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乃至研究结论都不迎合任何派别或潮流，只从属于内心的想法。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陈寅恪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先生历经数十年时间，为这样一个女子立下长达85万言的传记。很多人不解，以陈先生的博识广

闻和学术见地，为何不撰写更多的史学巨著，却花费如此长的时间为一个烟尘女子立传？陈寅恪用自己的研究说明，柳如是并非简单的歌伎，而是一名很有主见的才女，在那个年代，从事着反清复明的运动。她力劝其降清的夫君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他的研究有别于前人，给予了柳如是极大程度的肯定。他认为，柳如是是一个奇女子，比男儿更加重家国大义，为她立传是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因此不枉费他数十年的精力。

回顾陈寅恪一生，他的著作固然自开史学一派，为后人所仰慕和学习，然而观点是否正确，著作是否传世都非他毕生追求。正如碑文所云，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们才是永恒的存在，也是陈先生一生所恪守和铭记的信条。

### 郁郁而终的一代大师

---

“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黄萱（陈寅恪晚年助手）

---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著作颇丰、笔耕不辍的学者，却常年经受着极度的身体折磨。早在抗战开始之时，父亲陈三立因绝食而辞世，陈寅恪赴上海治丧，其时他的右眼已患严重的眼疾，需要立刻实施手术，但为了不留在沦陷区，他放弃了手术。之后他奔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一路的旅途艰辛加之对高原气候的不适应，使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与心脏病，而此时，他发现他的左眼也几近失明。得到牛津大学的聘请后，他曾努力赴约，却阻于战火。直至抗战后，牛津大学再度邀请，他终于赴英实施眼部手术，却以失败告终。从此之后，陈寅恪一直过着双目失明的日子。晚年的他，又因一次跌倒，摔断了右腿，从此常卧在床。

令人惊异的是，在失明、蹙足之际，陈寅恪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鸿篇著作的创作，其精神令人叹为观止。正如他晚年的助手黄萱所感叹：“其



坐落于清华园中的王国维纪念碑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著名的“陈寅恪小道”就在这栋房前

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寅恪受到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受到多位领导人的礼遇。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十分尊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陶铸听说陈寅恪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还亲自嘱咐在陈寅恪住宅前为他修建“陈寅恪小道”，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对知识分子有致命打击的“文革”来临。陈寅恪由原来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护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家中书籍被悉数抄走，陈宅从外到内全被大字报贴盖，正如陈寅恪夫人唐筼所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就这样，一代国学大师、史学大师陈寅恪于1969年10月7日清晨愤然离世。

陈寅恪晚年的写照正如他生平最后一首诗《挽晓莹》所道：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然而，正如陈寅恪所撰《柳如是别传》，历史终究会揭露真相。随着学术气氛的开放，陈寅恪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为越来越多的后人所论道，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日渐得以恢复。更有，他为人治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也为世人所称赞和铭记。

2009年10月25日，中山大学为纪念陈寅恪辞世40周年举办了题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纪念大会，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听者中无论是初入大学的新生，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都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深知这个名字所承载的文化重量。**☞**

（清华大学学生紫苑学会是以“学习、研究和推广清华校史”为宗旨的学生社团。学会网站为：<http://www.ziyuan.v.cn>）